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的传播者——陈豹隐

□ 钱 津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2013年5月5日,为彰显陈豹隐先生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中的重要历史地位,在成都西南财经大学举办了《陈豹隐全集》出版发行及陈豹隐铜像揭幕仪式暨陈豹隐学术成就研讨会。全国各地以及西南财经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人员约400人出席了此次研讨会,陈豹隐先生的部分直系亲属也莅临会议。我在大会发言中指出,中国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后学者都应纪念陈豹隐先生,陈豹隐先生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者。

一、陈豹隐首译《资本论》的时代背景

陈豹隐先生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传播者、《资本论》中文版首译者。经过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院和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两年多的精心筹划与编辑,《陈豹隐全集》首批两卷共十册已于2013年5月问世。《陈豹隐全集》的序言指出:“陈豹隐(1886—1960),原名陈启修,字惺农,笔名勺水、罗江,四川中江人。父陈品全,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恩科进士。陈豹隐早年在家庭中私塾进行启蒙教育,1900年入法国人兴办的广州丕崇书院。1905年他因赴法读书未果,遂东渡日本。辛亥革命期间,一度回国,在王芝祥第三军任二等参谋兼军需司副司长。后因黄兴失势再度留日,1913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政治科^①。1916年他在东京发起成立丙辰学社(后更名中华学艺社),并当选首任执行部理事。1917年受邀担任北京大学法科教授兼政治门研究所主任。1923年底赴苏联和西欧进修,期间先后加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并当选中共第四期旅莫支部审查委员会委员^②。1926年赴广州,出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国立中山大学法科科务主席兼经济学系主任等。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任武汉《中央日报》总编辑、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总主席、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等。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从事理论著述、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1930年重返北大,曾参与“第三党”(农工党前身)筹建和冯玉祥泰山讲学。抗战期间,历任第

一至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7年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1951年任重庆财经学院院长。1952年底因院系调整,调任四川财经学院临时院务工作委员会教务组组长。1956年被评为经济学一级教授。^③1959年当选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作为经济学家的陈豹隐,1914年翻译了小林丑三郎的《财政学提要》而初露锋芒,1924年出版了中国最早的自著财政学教科书《财政学总论》。1929年和1930年,他进一步翻译出版了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陈豹隐翻译的《资本论》,是《资本论》的首个中文译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史中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这是在极端艰难的历史时期完成的一个伟大的创举。

1929年和1930年,陈豹隐翻译《资本论》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陷入低潮的时期。当时,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人是在井冈山地区艰苦地摸索性地创建革命根据地,试图寻找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奔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道路。而同时,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瞿秋白的调和主义路线、各种各样的右倾投降主义的表现以及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遥控和不切实际的硬性指导,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几乎是灭顶之灾的损失,将许许多多的进步人士拖向了思想苦闷和认识迷惘的深渊。而就在此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陈豹隐先生在翻译出版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之后,默默地根据德文版并参照日文版翻译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于1930年3月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发行,使其成为了《资本论》的首个中文译本。

^①当时,帝国大学共分为东京帝大、京都帝大、东北帝大、九州帝大四所。东京帝大实行分科大学制,东京帝大法科大学下设法科和政治科,1919年分科大学制废止,经济学才从中独立出来。陈豹隐所读的政治科实际相当于政治经济科,分科大学制造就了他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的综合素养。

^②共同担任该届审查委员会委员的有李大钊、罗亦农、王一飞和王若飞。

^③1956年评定的全国经济学一级教授仅两名,即陈岱孙和陈豹隐。

二、陈豹隐首译《资本论》的历史意义

陈豹隐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之后,“潘冬舟又陆续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分册(北平东亚书局,1932年8月,即《资本论》第一卷第二、三篇)和《资本论》第一卷第三分册(北平东亚书局,1933年1月,即《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与陈译本构成一个系列。”^[11]虽然陈豹隐对于《资本论》的翻译尚未单独构成一个系列,但是,1930年《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的首个中文译本的出版,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

首先是开启了中国学者翻译《资本论》的进程。在陈豹隐之后,才有潘冬舟对于《资本论》的翻译;在潘冬舟之后,才有更多中国学者对于《资本论》的更为完整的翻译,包括郭大力、王亚南等人对《资本论》三卷本、四卷本的翻译。我们知道,直到今天,对于《资本论》这部巨著的中文翻译工作仍在继续之中,不少的考证和修订仍具较大的工作量,不少的翻译思想点还需要进一步地展开商榷讨论。然而,这所有的一切有关《资本论》的翻译工作,都是在陈豹隐之后进行的,都不能不承认陈豹隐这位先驱者的功绩和历史地位及至今依存的学术作用。万事开头难,翻译《资本论》也是同样的道理。且不说当年在陈豹隐翻译《资本论》的时候,中国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翻译出版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著作需要担当多大的风险,只就《资本论》的文字翻译来说,就是困难重重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领袖之一罗章龙曾经在北京大学组织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年他所在的这一学会的翻译室德文组曾试图翻译《资本论》第一卷,结果是硬啃,“实在不懂的地方,就把困难绕过去”。^[12]可想而知,这种首译性质的尝试,不论对谁,都是极其艰难的。无疑,陈豹隐对于《资本论》的翻译是中国学者在翻译《资本论》的历史进程中迈开的第一步。有了这一步,才会有第二步、第三步,才会有直到今天《资本论》在中国翻译及其研究取得的辉煌。这也正是今天全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人员和《资本论》翻译人员缅怀和纪念陈豹隐先生的重要意义所在。

其次是为中国革命者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方便。在大革命时期,有多少知识分子想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得而知,无法找到确切的数字,而且,这一人数肯定是十分巨大的。当时的情况是,很多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是听来的,即是听别人转述的,或是看到一些宣传材料,既缺少对于原著的学习,也缺少可供更多人学习的中文版革命著

作。即使在今天,在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在中国也仅有不多的人可以直接阅读外文著作,更何况80多年以前的中国,那时的大学生都是极少的,很多的革命者不识字或只有很低的文字水平,很多的革命知识分子也是只认汉字不识洋文,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陈豹隐对于《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的翻译出版,对于广大的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者直接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种学习的方便是极其有意义的,因为一位革命的知识分子读到马克思的原著,就能使至少上百的革命者听到这些著作中的革命道理,就会影响到更多的参与革命斗争的人民群众。有没有中文版的《资本论》,对于中国革命者来说,是不一样的。有了中文版的《资本论》,那些渴望寻求革命真理的人们,可以方便地自己阅读这一“工人阶级的圣经”,从中感悟革命道理,细细地琢磨马克思讲的理论;而若没有中文版的《资本论》,那些渴望寻求革命真理的人们,就无法直接阅读这一“工人阶级的圣经”,无法从直接阅读中感悟革命道理,无法一点一点地细细地琢磨马克思在书中做出的那些有关革命理论的基本论述。

最后是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著作,是马克思耗尽心血写出的经济学巨著,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中占据顶级地位,而且在19世纪的各个学派的经济学研究中也是独领风骚的。就此而言,若无中文版的《资本论》的翻译和出版,那就无法有效地准确地在当时中国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至少是在中国当时的经济学界无法有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种传播的历史作用是不可否认不可取代的,只是这种传播的力度和影响还是有限度的。因此,准确地讲,陈豹隐先生翻译出版的马克思《资本论》,只是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基础。而这一基础的奠定,无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播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陈豹隐翻译《资本论》的基本特色

与其他《资本论》译本都不同的是,上海昆仑书店公开发行的《资本论》首个中文译本中带有《资本论》旁释。(一)《马克思经济学说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这是Molitor的法译本上的导言,著者是考茨基。这篇文章把《资本论》著者所处的时代,《资本论》的来源,它的结果,它在一般学术史上的地位,它和同一著者的别的著作和工作的关系,等等,说得很详细。(二)《〈资本论〉在马克思经济学说上的地位》,这是日本河上肇著的《〈资本论〉入门》的序

说的第三节。(三)《〈资本论〉第一篇在〈资本论〉上的地位》,这是由两篇东西构成的:(1)是恩默特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要览并语汇》(W. H. Emmment, The Marxian Economic Handbook and Glossary)(纽约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发行,1925年版)的导言;(2)是河上肇在他和宫川所译日文版的第二分册的《第一篇解题》。^[113]对此,陈豹隐先生还在译者例言中说:“这三篇文章本是不同的人对于同一的书所写的文章,所以其中难免有重复的话;不过,从大体说来,的确是各有特色,可以合起来凑成这样一个《〈资本论〉旁释》的。”^[114]而这个《〈资本论〉旁释》也就构成了陈豹隐先生翻译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成书的一大特色。这样在翻译的《资本论》版本中加上这样的一个旁释,确实是其他版本《资本论》中所没有的。

陈豹隐先生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的译者例言本身也是颇具特色的。甚至可以说,整篇文章中主要讲的是关于“的”字的翻译使用。这在别人看来是一个十分不起眼的问题,可是在陈豹隐先生眼中,在他对《资本论》的翻译中,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已经闹了十几年,但是至今仍是没有弄出一个较稳便的办法。一些主张仍然单单用一个‘的’字的人们,在文艺创作或科学著述里面,虽然也许勉强拿一个‘的’自满,但是,一旦到了翻译名著的时候,就立刻会露出工具不充分,意义不明显的弊病;因为,如果要求翻译的正确,就不便太随意变更原著者的口气,而原著者在外国文上所用的那种和(1)当做形容词尾用的‘的’,(2)当作副词语尾用的‘的’,(3)当作一个表示所有格的前置词用的‘的’,三种东西相当的字本是用得非常繁复的,所以如果太随便变更语气,就会把所译的中文(特别是用眼看的时候)的意义弄得不十分明了。”^[114]由此就看出,陈豹隐先生的翻译工作是多么地认真仔细了。一个“的”字的用法,在陈豹隐先生翻译的《资本论》中有这么多的讲究,是超乎许多人的一般认识的。这不仅是一个文字的功底问题,更是一个如何搞好翻译的基本态度问题。在陈豹隐先生看来,必须要忠于原著的语气,这是翻译工作不可忽视的。因此,在陈豹隐先生翻译的《资本论》首个中文译本中,人们不难看到,忠于原著者即马克思的行文语气,是这个最初的《资本论》版本与以后版本不同的一个文字特色。

最朴素的直译语言文字也构成了陈豹隐先生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的突出特色。并不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中文语言与现代的文字语言存在着多么大的差距,

而是《资本论》的首个中文译本在闯路的时候自然就带有了文字的朴素精神。

举例来说,陈豹隐先生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的第一篇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翻译的:“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方法行着统治的诸社会里面,它们的财富是当作一个非常巨大的商品集成,出现着的,各个商品是当作那种财富的始基形态【这是 Elementarform 的译语,也有人译作要素形态,基础形态,原基形态,等等;照后面的说明看来,商品这东西,一方面是历史上的原始形态,一方面又是论理上的基本形态,所以似乎始基形态几个字较妥些——陈】出现着的。所以我们的研究就从商品的分析起。”^[113]

相比之下,现在看到的、由中央编译局组织翻译的《资本论》,同一句话的翻译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12]

无疑,后来的翻译更简练和准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比陈豹隐先生译的“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方法行着统治的诸社会里面,它们的财富是当作一个非常巨大的商品集成,出现着的,”表义更明了确定。“单个的商品表现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比陈豹隐先生译的“各个商品是当作那种财富的始基形态出现着的。”更为清楚、简洁。“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也比陈豹隐先生译的“所以我们的研究就从商品的分析起。”更通顺。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仍是能够清楚地看到,陈豹隐先生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的语言更具有特色,非常朴素和更体现最初版本的直译特点。

参考文献:

- [1] 陈豹隐全集:第二卷[M].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
- [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3] 钱津. 追寻彼岸:政治经济学论纲[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收稿日期:2013—09—02 责任编辑:谭晓梅)